

美国制造业复兴目前还是幻象

让·哈祖斯

随着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改善、财政负面冲击减少、大量闲置产能、低通胀等正面因素持续，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将会加快，2014 年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 3%—3.5%。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讨论美国经济复苏的性质问题。有人认为，美国将在“制造业复兴”带动下出现更偏向于结构性的复苏。最近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的迁移、加上美国相对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提升带来的出口，将给美国直接和间接创造 200 万-300 万个就业机会，这一因素将在本年代结束时降到 1.5%—2% 的失业率。

我们在研究过宏观经济数据之后认为，这种“制造业复兴”的证据并不存

在，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

本轮复苏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到了 5% 的可观水平，比实际 GDP 增速快一倍。此种现象部分原因是制造业相对服务业来说具有更强的周期性，但数据显示，制造业的增速超过经济中其他部门增速的幅度，还是超过了 GDP2% 增长环境下的正常水平。

放到国际环境下，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强劲势头更是明显。2011 年欧债危机和日本核事故以来，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的制造业反弹已经停止，并出现收缩，相比之相，美国制造业持续上行。

成本方面的数据也很出色。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跨国统计数据，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其他发达经济体要快 2%，这间接降低了单位劳

动成本。

最后，在页岩气革命之下，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出现了明显的能源成本优势。美国天然气价格比英国、欧洲和亚洲都要低，近两年来，这种价格差距越来越大，目前美国天然气价格只有亚洲平均水平的 1/4 到 1/3，这将大大有益于化工、基础金属等能源密集型行业。

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信号，但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复兴的太多证据，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制造业数据很出色，但美国经济 2009 年中期以来的总体复苏力度差不多是二战后历次经济周期中最缓慢的。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制造业复苏力度的不同，主要反映的是欧债危机和日本核事故对它们各自的打击。

尽管官方的生产率增长数据十分强劲，但美国出口——一个更为可靠的竞争力指标——充其量只是表现平平。出口份额是比跨国统计数据更可靠的衡量竞争力的指标，即便是单个国家的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数据，也容易混杂很多噪音，而进行跨国比较时，其误差更是很容易放大。相比之下，出口更能直观地说明，美国是否从其他国家那儿抢占了市场份额。分析 1985 年以来的美国出口表现与美元加权汇率之间关系可以发现，只有美元贬值时，美国出口才能获得一些改善，看不到生产率的因素。

有人认为，上述分析没有考虑到中国因素的影响。是否美国竞争力相对绝大多数贸易伙伴来说已经获得改善，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大幅度提高掩盖了这种积极变化？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我们把分析限定在美国与欧洲贸易伙伴之间，美国的出口表现最多也是中等水平。我们剔除欧洲内部贸易之后，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与美国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发现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出口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同基本相同的速度，这说明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长是受到全球贸易周期的共同推动，美国和欧洲之间并没有发生相对的竞争力变化。

认为美国能源成本优势将会全面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说法，看上去更有道理。毕竟美国能源成本优势最近 2-3 年才开始出现，其优势体现在资本支出、产出和出口等方面需要数年时间。产业统计数据显示，那些最容易受益于低天然气价格影响的制造业部门如铝、钢铁、塑料、基础化工、化肥等产品的产量至今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长。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看到能源生产和行业收入增长这一层直接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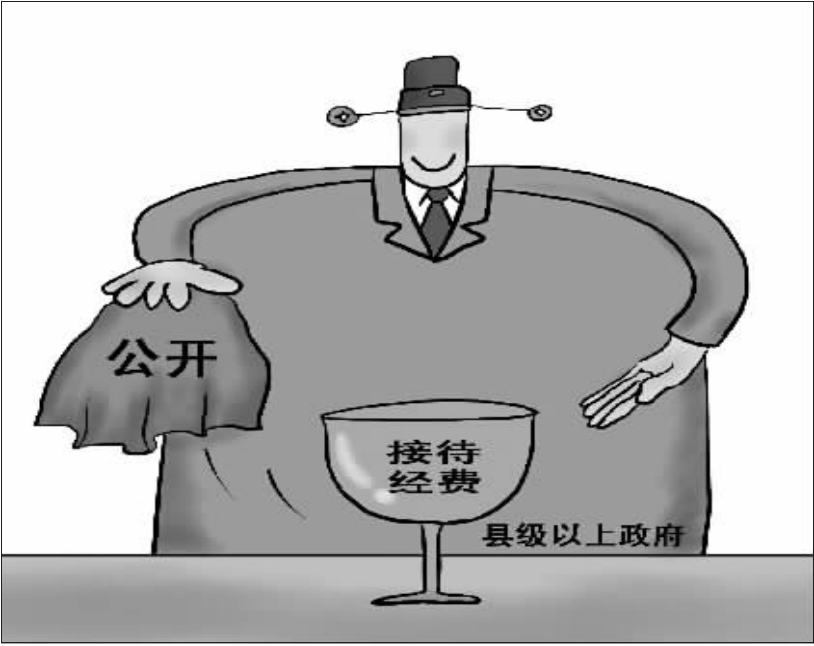
一个合理的估计是，相对于 2008 年之前的气价，现在的气价每年可能为工业天然气用户节省 200 亿-300 亿美元成本，大约为 GDP 的 0.2%。美国能源敏感型行业的总产出约占整个工业生产的 7%，约占整体 GDP 的 1%。因此，除非低能源价格能大幅提高这些行业的产量增长，否则其宏观经济效应可能是有限的。

美国制造业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制造业应会继续以略快于整体经济的速度增长。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机会仍然值得看好，这将与 2001-2007 年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更不用说其后的衰退阶段了。但我们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整体需求普遍改善，而非美国制造业出现结构性复兴。

（作者为高盛公司美国经济学家，王贞伟译）

焦点评论

今年起县级以上政府接待经费公开



接待经费将公开,县级政府率先来。廉政建设系生死,民心拥戴定成败。新政数月有亮点,积弊多年惹尘埃。公平正义在召唤,增量改革要加快。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今年货币政策走向不宜早下结论

贺军

“两会”之后，2013 年的货币政策走向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市场一般认为，今年的货币政策将秉承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基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

上述对货币政策的表态，体现了政府决策层对经济温和增长之下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希望通过审慎的货币政策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平衡，既能保持排在政府工作第一位的增长，又能防止通货膨胀。央行旗下最新一期《金融时报》载文称，中央银行只有针对本国经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进行操作，才能最大化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可以说，货币工具的选择考验着中央银行的智慧。

文章还引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钱颖一的话称，央行在过去一年中频频使用公开市场操作以调节流动性的做法，给市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央票回购及逆回购在调节货币流动性、控制通胀方面更为温和、慎重而且灵活。

春节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偏紧，逆回购淡出公开市场，正回购取而代之。近期正回购操作规模不断加码，公开市场连续几周实现资金净回笼。市场对此的解读是，伴随国内经济的逐步企稳，央行的调控重心开始由稳增长转向控通胀。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承认，货币政策开始收紧。

令市场关注的是，这种偏紧的货币政策在今年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央行会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在今年之内，央行会动用哪些政策工具？

对今年货币政策的猜想，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2013 年的稳健货币政策

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性”，不会进一步放松，也不会明显收紧，并注意把握好度和增强灵活性。在今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利率政策保持基本稳定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通过降息或是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幅度的方式来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的可能性。

在我们看来，从央行本身和市场的分析来看，都有一种共同的前提——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大问题，最好是维持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增速回升态势。这样将使得决策部门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掌握主动权，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只要经济增长不成问题，政府就能比较放心地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即使这样会降低一些经济增速，也能够接受。

然而，从今年前三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正是中国经济增长这一前提有可能发生变化。从工业生产、投资、引进外资、外贸增长、国际金融市场预期等多

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中的负面信号在进一步增多，维持 8% 左右的经济增长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容易，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资金用脚投票、撤离大中华市场的情况正在增加。从今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情况来判断，美欧日面临的情况要比中国的更加乐观，中国很可能遇到 2008 年以来最具不确定性的经济局面。

如果今年中国经济形势转向负面，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将面临调整。当中国经济出现较大的减速压力时候，决策层将陷入宏观政策的两难之中：是着眼于中长期目标而继续推动经济转型，还是更多考虑短期因素来放松调控？

时间已近 3 月底，相信对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判断已在进行之中。从时间上来看，政策上的变与不变很可能在 4 月下旬左右见分晓。整体来看，今年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目前还不宜过早下结论。

（作者系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 储心积虑 | Chu Zhusheng's Column |

以承担市民化成本来补偿农民历史性贡献



储著胜

农民两大历史性贡献

建国以后，国家从农民手上进行利益转移先后发生过两次：一次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使农民的利益在商品交换时被悄然转移，这一过程前后持续了 30 多年；一次是通过低价征收农业用地再高价拍卖的方式使农民的实际所得远少于其所失，这一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前者而言，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1953 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 1985 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国家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无偿地从农民手里拿走了 6000 亿-8000 亿元资金。这笔资金现在价值多少呢？我们不妨测算一下。有学者研究表明，从 1952 年到 2008 年，我国 GDP 累计增长了 77 倍，而从 1952 年到 2009 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则累计增长了 5923 倍，两相比相差 76.9 倍。理论上讲这就是上述 50 多年间我国货币的累计贬值程度。以此测算，上述 6000 亿-8000 亿元在 2008 年应价值 46 万亿-61.5 万亿，如果再考虑到 2008 年至今 5 年来的货币贬值情况，该数据以今天货币计量还会更多。

当然，前面这些数据都是选择该时间段前后两个时间极点的数值计算出来，有极端性，实际数据应该要比这些数据小一些。即便如此，农民因“剪刀差”遭受的损失用今天价格计算高达几十万亿元，应该是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这一数字的背后则是数亿农民无尽的艰辛与汗水。

至于第二次利益转移，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透露：过去几十年来，全国造城运动中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 30 万亿元左右。这 30 万亿当中绝大部分所有权本来应该归属于被征收土地的农民，但现行的土地制度却使这些农民根本享受不到这份收益。它们全部通过土地财政方式变成了政府的收益。很显然，这部分收益也是农民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当时是为了加快推进工业发展，而城市化建设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农民几十年来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所带来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我国在新政府成立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又持续保持了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目前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中国已成为一个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

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进行偿还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猛增长，现在到了该认真考虑如何补偿农民历史性贡献的时候了。那么该如何补偿呢？按人头分钱？肯定不现实，因为国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拿得出这么多钱，况且一次性补偿对于农民来说也不是个好办法。对农民的利益补

偿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同时也要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和长期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进城是个大趋势。城镇化是过去和未来几十年间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变革。不难看出，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政府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对进城农民实行倾斜政策，通过利益转移让更多的农民能够顺利进城并且可以在城市安稳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无疑是一种最恰当的补偿方式。

城镇化，特别是现在政府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市民化。这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因为农民转为市民并非改变一下户籍那么简单，户籍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如医疗、教育、养老、居住、交通、就业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一本户籍就如同一叠废纸，是毫无用处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是离不开相应的物质投入的。去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显示：今后 20 年内，中国将有近 5 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为此至少需要 40 万亿-50 万亿元的成本，也就是说平均每个进城农民需要花费 8 万-10 万。

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过，如果将其和农民群体在建国以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用地被低价征收所做出的利益贡献相比，数量上还是要小一些。因此，仅仅从农民利益补偿角度来看问题，城镇化建设所导致的农民市民化成本也应该主要由政府来承担。

当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用地被低价征收的受益者并非只有国家一个，实际上广大的城市居民也同样从中获得了利益，如可以用远低于商品内在价值的价格购买农产品、可以享受土地财政所带来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环境的改善等等。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原有的城市居民做出相应的利益牺牲是完全应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大量进城导致城市交通、居住、教育、医疗等各类资源全面紧张，进而促使其价格不断上涨，城市居民不应该仅仅是抱怨，要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偿还历史性欠账，因此，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承担一部分这方面的损失。

从政府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所对应的每一项支出几乎都关乎民生，而民生支出是政府最应该优先考虑的支出项目。因此，政府也有着足够的动力在农民市民化问题上下大工夫。剩下的问题是，政府通过何种途径才能解决农民市民化所需要的几十万亿巨额资金？

依靠土地财政吗？显然不行。因为土地财政本身就是建立在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基础上，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一种剥夺。现在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补偿农民，又怎么能够继续采取这种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呢？为了彻底杜绝这一行为，农用地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决维护和保障农民对自己所属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权。

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市民化所需要的巨量资金只能依靠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尽快转换职能，最大限度地精减机构，尽可能地吧“三公消费”等各类应该压缩的行政支出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民生支出；二是在整体减税的基础上进行税收结构调整，通过强力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资源税等有利于收入调节的税种来增加财政资金来源。